

1

民主的关头

马克·普拉特纳

后冷战世界

重新汇入世界文明

一种新意识形态？

挑战与对手

需要关注的国家

莫斯科 1991 年 8 月的重大事件应当说服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人，1989 年的民主革命确实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一条分水岭，长期固若金汤的整个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在那年的突然崩溃急剧改变了世界政治的面貌。加之苏联国内和国外政策已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一发展实际上导致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始自

1945 年，通常被称为战后或冷战时代。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已进入了后冷战时代，但对今后这一新时期的性质和特征的看法却存在着尖锐的不一致。

在探讨这个核心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地回顾冷战时代以及使之终结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月里，世界军事上的最强国和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开始分裂成以美苏为首的两个敌对阵营。以横跨德国中部和欧洲心脏地带的“铁幕”为界，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但东西方的分裂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分裂；它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列宁主义式的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对立。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国家尽力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自我标榜为不结盟运动或第三世界，它们是全球政治中一股潜在的独立力量，但更是超级大国展开争夺的地区。

尽管自 1949 年以来，这一体制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但其内部所发生的变化似渐渐地在增强苏联阵营的力量。现在几乎对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的是，共产主义政权长期以来是从内部分裂的，然而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主义似乎陶醉于一种微弱却稳定的优势地位中。它逐渐地把众多其他的非欧洲国家引入它的轨道；仅七十年代，在数十个国家里出现了亲共产主义政权。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这种优势似乎不可逆转。事实上，直到美国于 1983 年出兵格林纳达，从未有哪怕一个稳固的共产主义政权曾被取代过。

与此同时，民主制度在从非殖民化的浪潮过程中诞生的新民主政权那里获得短暂的意识形态援助后，似乎陷于深深的困境中。后殖民的民主政权几乎无一例外地很快垮台，让位于威权主

义的、且通常“不结盟”的政权，然而它们对西方却怀有强烈的敌意。1975年英迪拉·甘地把专制统治强加于印度似乎使非西方世界最大最重要的民主国家的历史告一段落，它标志着民主命运的最低潮。自由民主的一位坚定斗士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绝望地写道：在这一时刻，美国式自由民主制的处境正接近十九世纪的君主制的处境：政府形式的一种残留形态，它只在与世隔绝或特殊的地方存续下来，甚至可能特别适应特殊的环境，但它跟未来丝毫无关。它表明世界现在何处，而不是将走向何方。^①

虽然七十年代后期见证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以及民主政治在印度的恢复，但只有到八十年代才可以清楚地看到：莫伊尼汉的悲观主义没有根据，民主政体开始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复活。民主浪潮席卷拉美的大部分地区，直抵菲律宾、韩国、台湾及巴基斯坦这样一些重要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到八十年代结束时又开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甚至中东掀起波澜；此外，在八十年代第三世界如非洲的社会主义和拉美的官僚威权主义选择了民主制度，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却遭受了失败。

当然最显著的是，共产主义危机的不断增加，以及在一些地方的突然崩溃。八十年代不仅没有目睹到共产主义的新收获，就连尚存的共产主义政权也突然转攻为守。在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新生的亲苏政权受到美国支持的反共产主义叛乱的挑战。虽然这些武装抵抗运动在物质、经济及心理上对共产主义政府造成了打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没有掌握权力。除罗马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里胜利的反叛运动最初是亲马

克思主义的)外,东欧和第三世界共产主义政权主要是通过谈判、选举及其他和平手段交出了权力。当然,这种和平结局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共产主义在苏联这个核心部位发生的危机。至今我们仍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曾一度坚不可摧的政权何以这么快就能土崩瓦解了,也不能完全理解毁灭苏联的首要设计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动机和策略。看起来比较清楚的是,进入八十年代后,苏联面临着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停滞和改革之间的选择。但温和的改革被证明难以克服停滞,而若不坚决地削弱共产主义体制,大刀阔斧的改革亦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米诺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这位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见者、共产主义最为敏锐的分析家之一指出,共产主义自由化的后果就是共产主义的危机。

比经济上的失败和外交政策上的困境对共产主义造成更大危害的是其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怀疑。由于把他们体制的缺陷归于缺乏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在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苏联的领导人等于缴了械,从而给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感召力以致命一击。谁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奉献于一项已被其自己最杰出的代言人背弃了的事业?今天国际政治的英雄已不再是左派革命者,而是要求民主的那些和平抗议者。就此,也让我们注意一下可以被看成是1989年革命运动尾声的一起事件:尼加拉瓜人民在大选中和平地拒绝了桑地诺派。这就终结了第三世界中仍能引起西方同情的最后一个亲苏政权。

后冷战世界

我们因而发现我们大家生活于新的后冷战世界。这个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只有一项主导的原则，那就是民主。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但这一民主的关头能持续多久？民主的这种未遇挑战的优越性，没有真正的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对手，而可能只是稍纵即逝、昙花一现般的世界性的“美好情感的时代”，并将很快被新的可怕的分裂所取代？抑或要么是由于民主政体自身的内在力量，要么是由于反民主政体或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它标志着一场持久性的胜利？

对后一种论调最有力的阐述见于福山最近非常有名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他在文中断言，我们将见证到“人类的意识形态演进及作为人类政府之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之普世化的终结点”。尽管有理由对福山命题的形而上学的特征和宏大结论提出质疑，但就或可视为其文章的根本性前提（即对西方自由主义可行的系统性的替代品已经完全枯竭）而言，他是绝对正确的。^②

共产主义的崩溃和第三世界诸威权主义政权之明显的失败一并导致世界缺乏一位具有广泛号召力的非民主政权。它们同时也导致民主政权内公开的反民主力量的抬头。正如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使得西方反民主的右翼销声匿迹，共产主义的垮台使得反民主的左翼萎靡不振。

此外，也不仅仅是极端的或反民主的左派经受着“现行的社会主义”的危机。例如，原匈牙利地下作家、现国会议员米诺什·哈拉斯蒂（Miklos Haraszti），他对自己国家当前的政治光谱作

了如下描述：

总而言之，我们这里所具有的是一种非常古典的欧洲特征：对现代社会而言，保守的自由主义派别适合没有左翼的后共产主义民主的政治现实。……在后共产主义社会里，你们知道，左派已经死亡……因而我们所具有的结构是一种美国式的政治分野，在这种意义上，东欧的政治更接近于美国模式而不是西欧模式。^③

然而，哈拉斯蒂所描述的东欧发生的演变某种程度上在西欧（甚至拉美）同样能观察到，如社会党继续向中间派立场转变。^④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可能已没有了正统的极左派。在更发达的国家中，政治生活正趋于向美国模式转化——不仅受到美国竞选运动和媒体工具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到温和的中左派和中右派政党（它们普遍对基本的民主原则、民主程序有共同的看法，并日趋认同市场经济）的影响。

甚至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前，八十年代经历了自由市场经济在西方出人意外的复兴。不仅资本主义获得了知识分子的重新尊重，而且成功的企业家再次成为尊崇的对象。相形之下，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开始被等同于经济停滞而不是经济进步。共产主义，尤其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渴望显然增强了这一倾向。

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怀疑极其有助于恢复对自由民主的自信。它也有助于终结西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倾向：把现代民主政治看作是“逐步”地、永无止境地扩大国家的作用，甚至把社会主义看成自由民主制的逻辑顶峰。从这个视角看，共产主

义国家对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拒斥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地倒退，可无论如何它们有要求更“现代”、从而代表未来潮流的权利。最近东欧和苏联显现出来的迹象和证据已彻底动摇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

重新汇入世界文明

的确，在今天，自由民主国家被广泛地认为是惟一真正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表现出的生活于“正常社会”（normal society）的愿望反映了这种情绪。这种情绪不独持异议的知识分子具有，同时也被统治精英的众多代表——特别是那些已旅居国外的人——所分享，在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摒弃中，这种情绪起了关键性作用。

这些政权把它们的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上：它声称它的坚持者们组成了新世界的先锋。然而生活在这种政体之下的人民开始认识到他们正在走向落后与停滞，世界正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正在米兰·斯米卡（Milan Smecka）所称的“虚度光阴的重负”^⑤下工作生活。在对俄罗斯国会的一次演说中，鲍里斯·叶利钦谴责社会主义的历程把苏联人民放逐到“世界文明的边缘”^⑥。

在谈到重返世界文明时，苏联和东欧指的是他们想重新回到“欧洲”——欧洲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瓦克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捷克斯洛伐克的财政部长和公民论坛新当选的领袖，最近在回答一个关于他的国家经济政策的问题时说道：“我们对‘第三条道路’的解决办法毫无兴趣。我相信‘第三条道

路’是通向第三世界的最快捷的道路。^⑦还有许多人，既有西方的，也有第三世界自己的，现在开始把国家主义经济（statist economy）和非民主政体等同于腐败和倒退。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度最担忧的是他们的国家将被西方资本支配，而如今表现出来的担忧都是拉美或非洲将滑向世界经济的“边缘”。

的确，并非所有的非民主第三世界政权经济上都失败了。事实上，一些拥有相对开放市场导向型经济的威权主义政权——中国台湾、韩国、智利——已经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功。然而这一成功却正是通过提高并增加自力更生、目光远大的中产阶级的权力取得的，并引发了对民主政府的普遍需要，并导致在所有这些国家重大的政治转型。发展中国家威权主义的统治者看起来面临着一种类似第 22 条军规（Catch - 22）的两难，经济失败和经济成功都削弱这些政权的基础。

这些经济成功的第三世界威权主义政权吸引住了某些共产主义改革家的注意力。由此出现了独特的景观：在某些方面，中国台湾成了北京的楷模，皮诺切特在莫斯科的一些地方成了英雄。两国被这种“新权威主义”（新威权主义）模式吸引的理由是相类似的：它们断言，过早引进政治民主将必然使民众反对那些推行引入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痛苦措施。像皮诺切特式的铁腕人物在推行经济改革中是必要的，它反过来将为渐进地向民主过渡打下基础。令人感兴趣的是，应注意到今天有利于新威权主义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其受到指责的消解社会主义经济的能力。但即便新威权主义学说似乎也把自由民主制的最终优越性看成是自己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尽管对民主及市场导向的威权主义政权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增长的相关能力有商量的余地，但在发达国家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与经济成功相容。苏联式的指令性经济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可能取得重大成就，但建设更多更大的钢厂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在一个计算机和瞬息万变的全球电讯化的时代，革新、适应能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开放性、保持经济竞争力要更为重要。在政治自由受到严重压制的地方，这些特征很难长期保持下去。

民主政体较之军人政权还有另一种优势。尽管民主政体通常是爱好和平的，但它更能够生产、运用在战场上得以致胜的武器。正如亚当·斯密两个世纪前已经观察到的：“现代战争中，武器的巨额费用使那些能最大限度提供此费用的国家具有了明显的优势。”^⑧今天，如反击伊拉克的战争已证明，技术上的优势与战场上装备、部署、维持庞大的军力一样重要。想一想昔日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军事成就，今天如果真的相信在与威权主义国家军事对抗上民主国家软弱无力，将是何其轻率。然而，看起来在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过程中经济和技术不能保持同步的印象在加剧，这对说服苏联的精英分子踏上改革之路至关重要。

那么，民主政体似乎不仅在获得民众支持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上具有优越性，同时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也是如此。而且很难看出有新生的非民主意识形态的、经济或军事上处于同一水平的强大的挑战者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在表明，即便我们尚未达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至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持久的和平民主霸权的时代——一种“民主统治下的和平”（Pax Democratica）。

一种新意识形态？

也许对民主的胜利观最让人感兴趣的反论或许是由肯·乔维特（Ken Jowitt）提出的。^⑨ 尽管明显反对福山的见解，乔维特还是和他一样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导致了“自由资本主义是现今政治上惟一的全球政治文明”这样一种现实。然而，对乔维特来说，这只是他所称的“列宁主义灭亡”的一种近期的暂时后果。他辩解说，长期处于全面全球对抗的两大阵营中的一方的突然灭亡并未给它的敌手带来安逸的、没有挑战的优势地位，反倒会导致原先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根本的重构。

首先，它指的是隔开主权国家的地域边界。列宁主义的灭亡不仅加速了苏联的瓦解，也将释放出更加公开的种族冲突，并且重新划分原先受苏联帝国压制的人民的种族界限。众多历史先例使人们相信，帝国的瓦解将导致原先受压迫的人民中间长期潜伏的冲突重新迸发出来。布赖恩·厄克哈特（Brian Urquhart）曾任联合国主管特别政治事件的副秘书长一职达数十年之久，他曾说，在任职期间他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处理大英帝国遗留下的问题——阿以冲突、印巴冲突、尼日利亚内战、塞浦路斯争端上面。

（假如厄克哈特在这个岗位上呆得再稍长一点，他可能还会在这个清单上加上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冲突。）就算在今后数十年里联合国官员们发现他们同样关注由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或者克罗地亚族人和塞尔维亚族人之间的冲突引发的危机也毫不为怪。

但厄克哈特认为列宁主义灭亡所引发的混乱不会只局限于生

活在列宁主义枷锁之下的人民。冷战期间，超级大国对仆从国的影响以及对扩大冲突的担忧有助于维持地区现状。今天作为第三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的超级大国间的对峙已被极大地弱化，同样，它也不再能限制地区大国的野心。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是苏联帝国的退缩将会导致新的地区不稳定的生动例子。可以肯定，萨达姆被逐出科威特给第三世界独裁者传递了一条很有用的信号，让它们慎重思考发动地区性侵犯带来的后果。然而，我们仍有理由怀疑，在世界上战略地位并不重要的地区发生侵犯后，西方会如此果断作出反应。

乔维特的论点进一步断言，列宁主义的灭亡将导致局部战争增加，并可能导致重新划分边界。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被“扫地出门”后留下的真空可能会被新出现的意识形态所填补。他认为自由民主不可能在这一地带立足，因为从“它是作为社会生活之组织原则的理性而非人格的高度”出发的，故不能满足人类的某些基本愿望。因而，用他的话说，西方“将经常看到意欲破坏或改革的外部及内部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强调集体成员身份、感性的行为、集体一致、见义勇为等理念。”

福山可能会同意乔维特的很大一部分论证。因为福山从没有断言国际冲突的终结，他设想的是“重大的、也许是升级的宗教和民族冲突”，以及恐怖主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延续。他也未必不同意乔维特的预测：我们将会看到后者所称的发生在第三世界的“狂热运动”——反对象红色高棉和秘鲁的“光辉道路”这样的集团所体现的政治和经济失败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的强烈后坐力”。对这种可能的发展结果，福山在某程度上是这样回应的：

“我们的任务不是竭尽全力地回击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位古怪的弥赛亚对自由主义所发起的挑战，而只对那些体现在重要的社会或政治力量和社会政治运动，因而也是世界历史之一部分的那些挑战竭力予以回击。”

这就最终把我们带到了这两位作者分歧的核心部分。福山坚持认为自由民主的观念已确凿无疑地在世界先进国家赢得了胜利，因而不会再有新的受反民主意识形态激励的强国兴起。相比较之下，乔维特设想中的一种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将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其左右大国的能力足以和天主教、自由民主思想、法西斯主义、列宁主义相提并论的意识形态。

当然，我们只能推测是否会出现一种潜在的、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来挑战民主。福山雄辩地指出了自由民主观念广泛的号召力，它渗入各种文化并赢得全球支持者的能力，以及当前缺乏能把它从霸权宝座上拉下来的竞争者。然而，不具备多大说服力的是，他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已经根治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基本“矛盾”。正如乔维特所辩解的，无论到什么时候总有许多人对自由主义不满意，并因此将发动强大的反自由运动。真正的问题在于任何这样的运动在同自由主义竞争时能否具备必不可少的经济成功和广泛的号召力。答案只有在未来方可见分晓，而它对于民主的命运是决定性的。

挑战与对手

尽管具有广泛的民众号召力，民主政体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维持下去的政府形式，尤其是在缺乏受教育人口、重要的中产

阶级和民主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过去 15 年所发生的事件或许已揭示出这样一个观点：民主政体只在富裕的西方国家才能维持下去，但不应该因为这些事件就怀有一种无根据的乐观主义：即期待整个世界都很快地达到民主政体，并不间断地保持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民主制度鲜有失败，即便是在如秘鲁或菲律宾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其中一些国家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已经就职，例如尼加拉瓜、海地和贝宁，然而在努力创设稳定的民主制度时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使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虽然它们有欧洲遗产和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寻求引入市场经济、巩固民主政治体制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所有这些经验通常既受惠于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劲势头和声誉，亦得益于对被它们所取代的不成功的专制政权的记忆犹新。然而当这些记忆褪色，新生民主政权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困难时，也就只好看着它们中间的一些沦为威权主义政权。

毫无疑问，这一倒退是这些国家人民的最大不幸，它轻而易举地就能给既存的民主国家造成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难题。然而，只要针对民主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新敌手还没有登上舞台，那么，它对民主在全世界的总体命运不会有太大影响。一旦多数新生民主政权遭遇失败并退化为形形色色的地区性特色威权主义政权时，那么这样一种观点将再次流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政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制度，但其前提仍然成立，它是惟一适合经济上成功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形式。

那时将存在一个两层的世界，其上层是一个全球化的民主政治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其下层则是落后、失败的或是边缘化的

国家，在许多方面这将是一个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丑陋世界。处于困境的下层还可以再分出层次，但很难把它们完全孤立于民主国家范围之外。它还将在原材料的获取、非法移民、难民潮、饥荒、恐怖主义、毒品贩卖等一系列问题，还有一大堆的其他难题需要应付——其中的许多我们已经遇上了。假如像阿尔及利亚或者墨西哥这样的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性国家的经济或者政治出现大的动荡，问题将会变得更为严重。不过这些国家中的任何单独一个都不足以给民主的霸权造成致命威胁。

只有那些胸怀全球并证明能在经济或军事强国取得统治的意识形态，才能对民主的优越性构成严重挑战。虽然现时尚未有出现这种意识形态令人信服的征兆，但仍有必要简略地看一看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对手的几个主要竞争者。

首先一个是民族主义，即使当它的影响似乎在有些地方减弱的时候，它显然正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开始复兴。然而，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具有许多特征的范畴。塞尔维亚族的民族主义和克罗地亚族的民族主义，形式上也许有许多相似性，但前者对克族没有号召力，后者对塞族也没有号召力。况且，这样的民族主义不受任何政治秩序的影响。

譬如，我们可以看到，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既有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君主论者，亦有民主派。在许多特殊环境下，民族主义情绪的确可能威胁民主制度，而种族冲突无论对已确立的或新生的民主都可能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原则上民族主义并非跟民主政治不相容。事实上，正如波罗的海人民的情况清楚表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常常是极其民主的。

其次是宗教思想，显然激进的或者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是民主制度最可怕对手。它可能的确是今天在各地所能发现的民主制度最有活力的替代物。只是在信奉伊斯兰的各国人民对独裁政权的反对常常以非民主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自由选举将使伊斯兰的而非拥护民主的反对派获得权力，然而原教旨主义伊斯兰能给民主造成严重的挑战，这一点大可怀疑。

尽管伊斯兰教仍有八亿忠诚的信徒，统治着从西非延伸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区，但它似乎不可能从伊斯兰世界之外吸收更多的信徒。而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能否成为经济上或军事上成功的政权的基础，更需打个大问号。十年前当它在该地区崭露头角时，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似乎有巨大的革命热情，然而事实证明，它甚至赢不了与更小的邻国之间的一场残酷战争，也难以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输出革命，也不能管理现代的经济。现在看来它在奉行更为温和的政策，这可能有助于促进经济、稳定政权，然而，看来它甚至连伊斯兰未来的潮流也代表不了。

需要关注的国家

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可能的对手将是恢复元气后的共产主义，但 1991 年 8 月苏联发生的事件表明，硕果仅存的共产主义政权要想重新获得原先的活力将是何等艰难。它尤其使我们明白这样的事实：政变密谋者为其行动辩护时根本未提及共产主义。今日共产主义的命运似乎应验了莫伊尼汉 1975 年为民主制度所作的预言：“政府的一种残留形式……它跟未来丝毫无关。它表明世

界现在何处，而不是将走向何方。”

苏联的后续政权的性质和命运对民主的未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因为它们的幅员和国力，也因为它们能给东欧和东亚施加巨大影响。如果它能成功地沿着民主之路走下去，那么世界或许真将接近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制的永久胜利。但如果做不到，它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滋生反民主意识形态的温床。

民主政治刚在前苏联地区取得优势地位。然而国内还有其他不喜欢民主的政治力量，如强有力的幕后军事统治集团。俄国军队支持的新威权主义政权，可能在一段时间的混乱、甚至内战之后，以出现稳定的民主制度收场。这种类型的政权尽管最初可能会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暂时止步，但也可以很容易地终止向不可预测的反民主方向的演化。而如果这样的政权在经济或军事上成功了，那么它很快将成为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一种有吸引力的模式。

自由民主制度未来的另一可能的替代品可能来自日本和东亚的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通过对儒教和其他传统的、市场经济的以及民主政治的成分的吸收与综合，这些国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功。日本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以及中国台湾和韩国最近的民主开放，可以作为该地区自由民主制度胜利的依据。然而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运作与西方大为不同。如萨缪尔·P·亨廷顿已经指出的：“东亚的执政党体制体现的似是对权力的争夺，而非权力的轮换，似乎是所有党派都参加选举，但只有‘主流’党派才能执政。”^⑩

未来的东亚将更加趋同于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这并非定

论；它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东亚社会与西方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东亚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由于该地区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优越性，它可能对其他国家也极具吸引力。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初始问题上：民主的关头能持续多久？我大胆预测至少它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在下一个十年中，一些刚建立的民主国家几乎肯定要失败，但现在处于威权主义或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其他国家可能会走向民主。虽然对今后做出预测要冒风险，但在展望全球民主的远景时，俄罗斯、中国及日本是应当关注的三个关键性国家。

不过，还有另一个关键性国家——美国没有提及。换在八十年代，若哪位政治分析家企图以考察国际舞台为依据预测共产主义的未来，他几乎肯定要犯大错误。因为他可能没有考虑最重要的因素——苏联内部潜藏的失败。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美国处于类似情形下。然而作为美国政治的观察家可能会同意，有许多理由为美国民主制度的政治和文化健康而担忧。美国严重的社会或政治危机不仅对美国人是可怕的，它也对全球范围民主制度的命运有破坏性的影响。因而，对美国人来说最需要优先考虑的将肯定是修补我们自己的民主秩序。

然而，这里并不是在倡导美国“回家”，逃避它作为世界首要民主大国的国际责任。的确，美国的能量和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但如果进行合理的调配，对其国内和国际需要已是足够了。在推进国内民主和支持其在国外的扩展与巩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矛盾。正如健全的美国所提供的模式将增加其他地区对民主的渴望一样，世界各地民主斗争所取得的进展亦将使美国人重新估价